

史炳军
著

梁漱溟

与中国思想文化的
现代转型

非十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7HQ003) 立项资助

梁漱溟

与中国思想文化的 现代转型

史炳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漱溟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 / 史炳军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3

ISBN 978-7-214-26752-8

I.①梁… II.①史… III.①梁漱溟(1893—1988)
—哲学思想—研究 ②思想史—研究—中国 IV.①B262
②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55136 号

书 名 梁漱溟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
著 者 史炳军
责任编辑 张晓薇
助理编辑 陆诗濛
装帧设计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 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页 2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2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6752-8
定 价 7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积淀和璀璨的成果，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数千年来薪火相传、代有高峰，是世界人文历史中的奇观，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长期以来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塑造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是激励民族奋进的精神支柱、凝聚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世界，由一个“亚洲之国家”一变而为“世界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开始加剧。西方各种思想文化亦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和严峻挑战。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国知识界面临着接受、拒斥或超越的艰难选择，处在情感与理智的紧张和纠葛之中。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寻找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超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关心和思考的话题。从20世纪20—3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到80年代的文化热，这一主题不断呈现，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梁漱溟也是在这一时期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国向何处去、人活着为什么是他一生关注的两大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他身上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他始终将个人的小我融入民族的大我之中，在民族复兴出路

的探寻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针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现实,梁漱溟把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并为之鞠躬尽瘁。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本质上是文化失调问题。面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接连遭受的挫折与失败,梁漱溟认为,缺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同情理解,也就无法真正吸收西方文化,融入和引领世界潮流。中国问题的解决之路就在中国文化的自我革新和自我改造,即“老根上发新芽”,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活力。他一生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从文化问题入手,为中华民族开辟一条新道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奠定其在学术界地位的著作中,梁漱溟一方面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以意欲的不同取向来说明中西印文化的不同;同时坚持文化多元论,强调中国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取代的价值和地位,主张未来世界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以此作为他对“五四”以来各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应。在古今中西关系上,他既坚持古今之异,又强调中外之别,主张各民族的现代化应该从本民族传统出发,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他从传统文化出发探求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尝试。他既反对西化派对传统文化的简单摒弃,也反对国粹派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在他看来,传统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传统固然包含有过时的、落伍的东西,但也包含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普遍性要素,这正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也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挥之不去的根和魂,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必须从本民族的传统出发。他反复告诉人们,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他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就是从传统文化入手,开出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他对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理解,对我们今天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会有重要启迪。

史炳军同志 20 世纪 80 年代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期间,即跟随我从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其后长期在高校工作,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领

域耕耘,在许多问题上有他独到的见解和认识。《梁漱溟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书,把梁漱溟放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历史长河中,以《梁漱溟全集》为第一手资料,对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对推进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书有

2021年8月18日

目 录

前言 独一无二的梁漱溟	1
一、忧国忧民的文化心态	2
二、意欲为本的文化比较理论	3
三、“理性早启”的文化批判理论	4
四、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理论	4
五、道德至上的文化价值理论	6
六、六经注我的文化研究方法	7
第一章 梁漱溟的生平及思想历程	11
一、功利主义思想时期	12
二、佛学的选择与沉溺	16
三、新儒学理论与实践	17
第二章 梁漱溟的宗教思想	40
一、早期佛学思想	40
二、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48
三、儒释道互补理论	57

第三章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 64

- 一、中国文化观 65
- 二、西方文化观 84
- 三、文化比较理论 100
- 四、文化研究方法 108

第四章 梁漱溟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 114

- 一、乡村建设的缘起 116
- 二、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122
- 三、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130
- 四、乡村建设的基本特征 138

第五章 梁漱溟的心性学说 151

- 一、早期以“本能”为基础的道德人本主义心性论 152
- 二、中期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心性论 164
- 三、晚期以“人心”为基础的知情意统一、真善美合一的心性论 176

第六章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186

- 一、中华民族现代化探索的艰难历程 187
- 二、“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求索 194
- 三、梁漱溟：“老根”发“新芽” 199
- 四、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207

附录一 梁漱溟大事年表 210

附录二 参考书目 219

前言 独一无二的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是 20 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中国近现代史众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终其一生，他勤奋治学，刚直不阿，为国奔波，关心民情，知无不言，光明磊落，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座右铭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毕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奔走和思考，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和追求。“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①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危机，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危机，中国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中国问题的症结，他归结为严重的文化失调。他以文化问题为切入点，终生致力于人生与社会问题的探讨，欲替中华民族开辟一条新出路。在 1952 年写的《我的努力与反省》一书中，他说自己平生有两个志向与努力：“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

^① 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8 页。

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①其钩玄决疑的理论探索、一代直声的人格风范，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文化理论在 20 世纪学术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不朽的地位，我们认为，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忧国忧民的文化心态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是爱国主义的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是他生命生活的真实写照。从青少年时代起，民族意识和忧患情结就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民族主义成为理解梁漱溟思想的重要线索。他曾说：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认识我，我实在不是学问中人，我可算是“问题中人”，而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始终是他思考的核心所在。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是萦绕梁漱溟一生的事业。学生李渊庭说，“梁老师毕生致力于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前途问题。他老人家从青年到晚年，始终围绕这两个问题读书、讲学、写作并从事社会活动”^②。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使他出入于西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文化；对中国问题的追问，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他认为，只有文化问题才是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民族问题，本质上都是文化问题。在他看来，“文化改造之任务，不在一社会文化中心之知识分子而又在谁？”他一生的奋斗，就是力图通过文化问题来解救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一系列危机，谋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替中华民族开辟一条新道路，他抛弃安逸的书斋生活，投身到艰苦的农村中去，经历多次惊险奔波，备尝风雨饥渴之苦。为了国家民族的大计，他不计较个人恩怨。民族的危难与众生的苦痛，始终折磨着他。他探究佛学问题、儒学问题，搞乡村建设，

^①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9 页。

^② 李渊庭：《沉痛悼念梁漱溟老师》，载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第 387 页。

无不浸透着他的爱国热忱。他是一个思想与言论相统一的人，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在梁漱溟先生身上得到生动的再现。为了促进国共联合抗日，他四处奔走呼吁，先后发起并参与创建“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亲自到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口诛笔伐，阐明民主建国、厉行法制的政治立场，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二、意欲为本的文化比较理论

梁漱溟先生从文化多元论立场出发，分析了中西印文化的区别，目的是重新界定中国文化的地位与价值。梁漱溟先生坚持文化整体主义观点，他认为，文化即生活的样法。中西印文化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人生态度的不同，而人生态度的原动力即是意欲。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人生有三种问题，即人与物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人与自身的问题。这三种问题的解决有其逻辑先后顺序：首先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其次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最后解决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据此他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分属于人类文化高低不同的三个阶段。梁漱溟先生终生坚持二分世界的思维模式：西方文化以关注事实世界为特点，中国文化以关注价值世界为特点。前者属于科学问题，后者属于伦理道德问题。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后者亦难代替前者。尽管梁漱溟先生的文化比较理论存在着一些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但他肯定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价值，突破了泰勒以来流行的文化一元论传统，这在民族虚无主义与全盘西化思潮盛行的背景下，增加了国人的自信，挽救了当时知识界普遍存在的意义危机。

三、“理性早启”的文化批判理论

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社会思潮背景下,梁漱溟敏锐地看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他高举东方文化的大旗,反对把“西化”等同于“世界化”,竭力彰显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为中国文化生命的延续鼓与呼。梁漱溟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弘扬工作,但同时他对中国文化的缺陷与弊端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剖析。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站在一个醇儒的立场,对歪曲孔子本来面目的人和他们所传的假孔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重新诠释了一些儒家的基本范畴,如“仁”“孝悌”“天理”等。经过这样的解释,儒家中那些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内容陈腐过时、且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东西,被他视为假儒学而剔除掉了。而被他视为真儒学并加以认同和弘扬的,只是孔家的生命哲学及能给人情感方面安慰的功能。他同时批评了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他认为墨子事事都问一个为什么,完全是一副理智计较算账的人生态度,把葬也节了,乐也去了,把人完全变成了机械,丧失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缺陷与成因,将之归因于“中国文化早熟”或“理性早启”。这种以“理性”为特征的文化,最合乎人类心理的要求,所以人人都愿意信从,因而传播得远,同化力强。但同时这种早熟与早启,导致中国文化有五个严重缺陷:幼稚、老衰、不落实、消极而没有前途、暧昧而不明爽。应该说,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深刻而系统的,的确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些要害,高出时人一筹。终其一生,他的文化重建始终是与文化批判同时进行的。

四、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理论

梁漱溟先生认为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他常称自己

为社会活动家或实践家，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他因此也被美国汉学家艾恺称为“中国的甘地”。他多次讲到，“以哲学家看我非知我者。若说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说我是有思想而又本着这个思想行动的人，便恰如其分。若说我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说我是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①他认为自己最终的目的是将自己对宇宙人生问题思考的结果实现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终生不仅尽其性，而且践其行。基于这样的个性，怀着“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使命意识，无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身体力行，还是民国时期的新闻记者生涯，都是其入世情怀的真实写照。在认定了世界文化的未来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后，他便把目光投向了他认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最浓厚的地方——农村，欲从老根上培育出新芽。他认为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以来再转再变的一个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这一次要往东走。在他看来，他所从事的社会运动，其本质是指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建设以乡村为重心的新文化。梁漱溟从乡建入手提出的现代国家建设方案，对于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国家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始终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心”。他后来回顾说：“静心反思，自己不图安逸，不图享受。粗衣素食，并无家产，教书著说所得几乎全用于兴办教育或接济同志。甚至自愿深入敌后，跟着游击队昼夜行宿于荒山野岭，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支配着自己呢？扪心自问，则源于能立志改造中国，为国家民族做事。”他终其一生，“仁以为己任”，以民主人士之身始终不渝支持中国革命，对国家前途不失信心。他言行一致、刚直不阿、廷争面折的精神，匹夫不可夺志的铮铮风骨，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讲，无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① 唐弘仁：《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人民政协报》1991年6月28日。

五、道德至上的文化价值理论

梁漱溟先生认为,衡量人类文化发展的标准是道德精神。他将精神活动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本能、理智与理性。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是一种道德存在,只有具备道德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以理智为人类的特征,未若以理性当之之深切著明,我故曰:人类的特征在理性。”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理智主义或科学主义,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理性主义或道德主义。他有时也用“有对”“无对”来概括中西文化的区别。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文化所为与西洋大异者,实由古人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认识了无对有以开其先,立其基。故言中国精神,必举无对乃得也”^①。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认为只有从理性出发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途。“解决中国问题要如何才行呢?只需顺着‘从问题多而不定所开出来的’理性走去便好。这个理性就是‘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往复综合于意识’的意识。这个意识是民族自觉(对外),同时是社会自觉。何谓社会自觉?不是从大社会里面,意识到自己这一小份,而却是离开自己,意识到整个大社会。中国问题本是最能启发这个意识的,只需顺着去发达这个意识,加强这个意识的作用,中国问题便得解决。这样得解决时,就谓之理性的解决。”^②由于理性早启,中国文化避免了愚蔽与强暴,不尚武力,不求争持。理性高于理智,因此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是不言而喻的:抛弃传统文化是愚蠢之举。梁漱溟先生就此解释了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缓解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张力。

^① 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第78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7页。

六、六经注我的文化研究方法

梁漱溟先生认为自己的长处有两点：一是好学深思，思想深刻；一是不苟同于他人。在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中，梁漱溟先生充分吸纳各门学科如佛学、生命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的最新成果与方法，从而使他的文化理论独树一帜。同时，由于他一生受到儒学、佛学、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等各方面的影响，有的理论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和领悟就加以运用，所以思想不清晰甚至自相矛盾之处颇多，而方法论上最大的特点是六经注我、主观主义。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末尾，他谈到自己对儒家典籍及古义的态度时说：“我是先自己有一套思想再来看孔家诸经的；看了孔经，先有自己意见再来看宋明人书的；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他认为文化只有主观的“因”，其余都是“缘”。他说他对文化的研究“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对西方文化民主、科学的吸收，对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引进，都是建立在他的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在他的诠释下，传统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它的真正价值并非存在于过去，而是存在于现在和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漱溟对新中国政权的建立由衷地高兴，对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钦佩，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他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是有前途有希望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是建立在他的心性说基础上的，他认为中共的三大贡献之一，就是“透出了人心”。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

以文化言立国言救国，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回应，也是对近代以来各种救国主张和理论的超越，而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既折射出梁漱溟内心深沉的爱国热情，也表现出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发展态势和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道路的充分自信。“治学邃于思

辨抉幽发微著述等身,首倡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弘扬东方学说,探索人生真谛自成思想体系中外共仰,道德文章无愧一代宗师;处世巍然卓立先忧后乐天下为怀,发起鲁豫乡村建设运动组织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日报关心民间疾苦宠辱不惊,高风亮节堪称举世楷模。”^①学生李渊庭的这幅挽联是对梁漱溟先生一生行迹的真实写照。梁漱溟先生以其人、其学、其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史上不朽的地位,成为研究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绕不过的丰碑,著名学者林毓生称梁漱溟和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诚如艾恺所言:“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且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 20 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接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实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②

“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生,并迅速地茁壮成长。”^③梁漱溟出生前后,中国历史正在经历人类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在苦苦寻觅未来的出路。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且产生英雄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产生思想家的年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梁漱溟在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中,几乎参与了这一时期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众多的政治人物、思想家、教

① 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第 420 页。

② 艾恺:《初版序言》,载梁漱溟、[美]艾恺著《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IV 页。

③ 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载郑大华著《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育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乃至底层百姓有人生交集。他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而且把复兴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终生的志业，并且身体力行，通过乡村建设来实现他的理想。内圣而外王的人生追求，在他身上得到了生动的再现。诚如戴逸先生所言，一方面，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都是旧时代的过来人，都曾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即使最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那一代的学术前辈，不论他们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都不可能完全反对、拒绝西方文化。“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①因此，对于梁漱溟的研究，我们不能受制于“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解释模式，诚如学者陈来先生所言，“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是在世界现代性的发展中被规定的，受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影响而发展的。单纯的‘激进—保守’的解释模式，并不完全能够解释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保守’不一定是对‘激进’的直接回应，而是产生于世界政治—文化的过程中的复杂互动。随着20世纪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不仅大大进步了，而且更加及时了。西方社会与思想新的发展，在中国都会很快引起注意。特别是有关东西方文化与人类文化前途方面，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动向，中国人更为敏感。”^②同时应超越传统的“革命史”研究范式（按照这种解释模式，以对革命的正面理解和评价作为理解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变革的前提和基础，所有其他的研究包括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中外交流史都应该围绕革命史这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来进行，这也是国内史学界长期流行的单线突进的阶级斗争史观^③），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① 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载郑大华著《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第3页。

② 陈来：《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7—489页。